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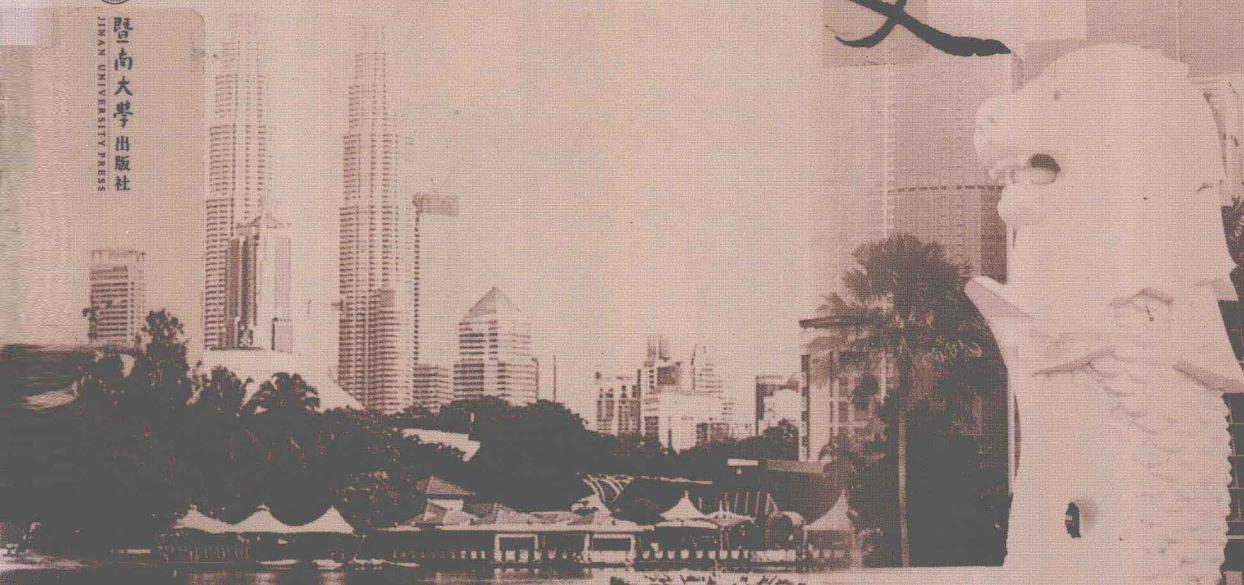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華文書法百年史

谢光辉 陈玉佩 著



暨南大學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華文書法百年史

谢光辉 陈玉佩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加坡 马来西亚华文书法百年史/谢光辉, 陈玉佩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 - 7 - 5668 - 0595 - 9

I. ①新… II. ①谢…②陈… III. ①汉字—书法史—新加坡②汉字—书法史—马来西亚 IV. ①J292 -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09871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近日，收到乐斋夫子谢光辉教授寄来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书法百年史》书稿，拜读一过，感慨良多。先生提出要我这个学生来写序言，我心里不免打起了鼓——为著作序言者，或学界名流，或社会贤达，我一个学生晚辈，何德何能堪此重任？但先生认为我是本书的一个见证人，了解该书撰写的全过程，可以比较客观全面地向读者介绍这本书。乐斋师视众生平等，并不以老幼尊卑贤愚介怀。因此我就不辞浅陋，斗胆接受了这个任务。

说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书法，中国国内大部分人恐怕是很陌生的。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新、马书法的交流活动频见报端，但是将新、马书法进行专门和系统的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是新课题。而这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书法百年史》堪称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本书研究视野开阔，内容丰富。她将百年来新、马的书法发展历程与华文教育、美术教育、华人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等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虽曰书法史，实则并非仅限于书法。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书法当然是源于中国。这既是新、马书法发展史的起点和源头，也是中国书法域外传播的一个方面。因此该书具有了丰富的、多侧面的研究价值。一般认为，当代不写史。这是由于作者与研究对象时间太近而使评价可能有欠公允，也由于年代太近资料缺少自然淘汰而显得过于芜杂，而这两点都会影响到研究结论的客观全面。但是面对客观存在的过去百余年新加坡、马来西亚书法的发展历程，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因上述原因而停止研究，也不能算是一种积极的研究态度吧。因为新加坡、马来西亚书法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对过去的百年历史进行阶段性小

结，分析得失，以期对未来发展能有所启示。同时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日益加强。此时研究中国书法在国外传播和发展的历史，探求中华文化艺术在国外传播和发展的经验和途径，也属当务之急。这部著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

全书对新加坡、马来西亚百余年来书法发展历程进行了详细梳理，通过对百余年来有关书法的新闻报道、文献记载、书家回忆录、书法教育资料、书法展览赛事资料、书法艺术团体及其活动等资料的细致分类整理，将这百余年的历史分作了四个时期，即启蒙与孕育时期、低迷与沉寂时期、危机与困境时期和蓬勃与发展时期，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了新、马百余年来书法发展的大致脉络。虽说这是一部研究书法发展史的学术著作，但其中并不乏对美术、华文教育、政治变更等更为广阔的历史景观的叙述与分析。这些更为深沉的背景与书法的发展其实是同步或曰相伴相生的。如在华文教育处于低迷的时候，书法教育同样低迷。这是由书法与汉字、汉语的天然关系决定的。而时代的大背景包括国家的文化政策、教育政策等因素，对书法的影响就更加直接。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马来西亚实施的旨在限制华文小学的“小学新课程”政策，影响的不仅仅是华文教育，书法教育同样受到重创。至 20 世纪 90 年代，马来西亚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同时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外文化交流步伐的加快，华文书法也因此获得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因此，作者将这一段时间定性为“蓬勃与发展时期”。

纵观全书对新加坡、马来西亚书法发展史的分期以及对发展规律的探讨，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即新、马书法的发展与华文教育（包括美术教育）的发展几乎同步。因此国家的教育政策对书法发展的影响非常之大，远远超过中国国内的同类情形。教育政策对华文教育的影响就是对书法发展的影响。这一规律的发现，其实不仅仅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书法在未来的发展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而且对中国国内书法的发展也不无参考价值。如今即使在中国，国民的书写水平的普遍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确实与教育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国民书写水平的普遍下降对书法的持续和健康发展，当然是有影响的。尽管中国国内的书法发展更多的是靠着书法自身数千年来的自我发展动力和惯性，但是从长远来看，教育政策对书法的影响确实不容忽视。尤其是对当下的中国来说，教

育政策与书法发展之间的关系，学者们确实有必要作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此外本书还对百余年来为新加坡、马来西亚书法发展作出贡献的书法家、书法教育家和活动家等一批人物进行了介绍，可以说是为他们对书法的贡献树碑立传。这也是写史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以为这部著作作为新、马书法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在资料的占有、整理以及运用方面也做得非常出色。书中还有七个附录以及多幅图片（包含历史人物和事件照片与书法作品图像），足见其占有资料的丰富，也可看出本书的研究结论有着扎实的资料基础。而这一系列的附录，更为该领域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资料的便利。可以想见在不远的将来，随着资料的进一步丰富，一定还会有更扎实、更丰富的新、马书法研究新著问世。

最后，我还想说说本书的另一位作者陈玉佩。她是马来西亚籍华侨，祖籍福建泉州南安，生于马来西亚，从其爷爷下南洋并在马来西亚定居，到她已是第三代。由于家庭背景的缘故，她一直未间断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2002年秋，玉佩、张俊岭、陶贤果和我同时考入暨南大学艺术中心，师从陈初生、曹宝麟和谢光辉三位老师，攻读文艺学书法方向硕士研究生学位。而此前她已经在暨大读了四年本科，算是暨大的老学生了。由于玉佩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有研究东南亚华文书法的便利条件，所以一入学，陈、曹、谢三位导师就建议她主攻新加坡、马来西亚书法史。2004年，谢老师以“华文书法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传播与发展”为题主持申报国务院侨办的研究课题。玉佩参与了这项课题，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她的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谢老师又以“东南亚书法史研究”为题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历经三年多的努力，终成此著，并以之作为研究的最终成果进行结题。

翻阅着书稿中的一幅幅作品、一张张照片，我不禁回想起十年前在暨南园的求学光景。那时的我们，年少气盛，风华正茂。如今，曾经的青春岁月正在渐渐离我们远去，留下的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谨遵师嘱，是为序。

后学李吾铭于湛江四壁清风斋
2013年5月31日

前 言

在东南亚诸国中，新加坡、马来西亚是华侨华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华人文化是该地区最为突出的文化现象之一。早在 15 世纪就有中国商人到马六甲经商，以丝绸、茶、陶器等商品换取当地的香料、地毯、巴迪布等物品。19 世纪中叶，马来亚的种植业及采锡业蓬勃发展，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工。因此，英国殖民政府实施“招徕客工”的政策，通过当地的华人从中国闽粤地区引进大量劳工。最初到来的劳工，大部分是文盲。一直到了 20 世纪初，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把新、马作为重要的活动基地，创办报刊，兴办学堂，此时才有较多的知识分子从中国闽粤地区南来。同时，新、马两地的商业广告日趋发达，也吸引了不少中国大陆的艺术院校毕业生或从欧美深造回来的艺术家前来谋生。他们开始在新、马两国土地上播下中国传统艺术的种子，使华文书法得以在此孕育和发展。

20 世纪新、马华文书法是随着华文教育和其他美术教育的发展而发展的。1945 年以前，华文书法在马来半岛（包括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传播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即正规美术学院的教育和民间文人的传播。

（1）正规美术学院的教育。1938 年，新加坡创立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在南洋美专的水墨画系，笔墨技法和书法线条的训练被作为美术训练的基础，所以举凡水墨画专业毕业的学生，皆在书法上颇有造诣。如水墨画家施香沅执教南洋美专，就非常重视书法的训练，不仅培育了水墨画人才，也间接培育了许多书法人才。

（2）民间文人的传播。书法造诣较高的中国文人南来之后，大多数在教育界服务。如孔翔泰，江苏宜兴人，在马来西亚执教四十年。他师承颜体及赵体而创“孔体”，影响了槟城一带的华人。李秀添的书风则影响雪

兰莪及吉隆坡一带的华人。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自行独立，两地书法因各自文化政策和教育制度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发展倾向，产生了明显的差异。新加坡是除中国、日本、韩国等国以外，华文书法活动发展最为蓬勃的一个国家。这应该归功于20世纪南来的文人和艺术工作者。他们在新加坡创办美术学院，成立艺术团体，辛勤培养后进，使得新加坡的书法能够蓬勃发展。其中，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是主要的舵手。他全力以赴、不遗余力地推动书法活动和对外交流。同时，20世纪60年代接受华文教育的年轻人，在80年代也已步入青年期。他们和陈声桂并肩作战，共同推动华文书法的活动和交流。至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社团。

马来西亚华人在当地坚持发展华文教育的同时，书法也在不断地成长，并开始强烈渴望形成自己的区域风格，以有别于中国大陆及日本、韩国等地。如今，随着华文教育的普及和深入，在华人社会里学习书法已是一件十分普遍的事情。原因在于华文小学学生从三年级便开始学写毛笔字，书法是每周必交的功课；而在初中的会考中，书法亦被列为华文科的必考项目之一。1988年，马来西亚的“全国华文独立中学统一考试”开始将书法列为高中美术科的选考项目之一。这个时期书法作为学校的课程和考试项目之一，在马来西亚得到迅速传播和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马来西亚华人学习书法的普及度已超越了西洋画，而且有不断增长之势。同时，新、马两地的书画交流日益频繁，至今未曾中断过。当中国崛起后，华文的价值不断提高，其地位也备受重视。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我们看到华文书法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发展的前景是一片欣欣向荣的乐观景象。

近年来，华侨华人文化历史已成为东南亚地区的热门研究课题。学者们从政治、经济、宗教、风俗、文化、教育等角度进行探讨，并已在文学、戏剧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出版和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著作和论文。但是对该地区书画艺术的研究却较为薄弱。特别是对于该地区华文书法历史的研究，更是不大被人重视。例如，马来西亚“唯一”的一本以中文为主的艺术刊物——《艺术走廊》，刊登有关书法的文章就非常少，而且仅限于一般书法活动、书家生平的介绍。另外一本自誉为马来西亚唯一华文思想人文综合杂志的《人文杂志》，竟从未刊登过一篇有关本土书法

历史研究的文章。其前身《资料与研究》也是如此。而1999年钟瑜所著《马来西亚华人美术史（1900—1965）》，也没有将书法列入考察的部分，只是将之附属于水墨画中的一笔带过。其他有关文章，大部分以书法入门、学习心得为主。很显然，东南亚学术界对书法艺术的关注仅限于文化的传承，对本地书法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如何继承中华文化与书法的未来发展尚未认真思考过，也未公开地讨论过，目前仅停留在本土书法去向的提问上。而中国国内学者对此也是少有关注，有关的介绍文章极少，更谈不上研究，以至于人们对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书法的认识仍然处在一片混沌之中。因此，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下，研究中华文化的继承与本地书法艺术的历史、现状及其未来发展是非常必要的。这对于帮助人们认清本地书法发展的历史，以便更好地继承和延续这一中华文化的重要艺术表现形式，促进华文及汉字教育的发展，激励马来西亚华人重视本土文物保存及维护，提升本地华人对书法艺术的鉴赏水平，激励当代书法家创作与研究，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特别是对于中国了解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华文书法近百年艺术的历史与现状，以及中华文化艺术在海外的传播和发展状况，促进中、新、马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与合作，具有现实意义。

本书以20世纪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书法为研究对象，试图在有效整理马来半岛地区华人书法史料的基础上，从教育和组织活动等角度对之加以考察，并通过对各地区、各时期书史、书迹和书法家创作风格与前后传承关系的分析，梳理20世纪近一百年华文书法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传播和发展的实际概况与演变脉络，构建其书法发展的历史框架和理论体系，同时为两地当代书法的发展提供一个参考。根据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我们将20世纪的新、马华文书法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华文书法的启蒙与孕育时期（1900—1945）；第二个时期是华文书法的低迷与沉寂时期（1946—1956）；第三个时期是华文书法的危机与困境时期（1957—1980）；第四个时期是华文书法的蓬勃与发展时期（1981—2000）。各时期主要考察三方面的问题：一为该时期的华文教育与书法教育，重点考察华文教育对华文书法传播与发展的影响；二为该时期的书法团体与书法活动，主要考察各种社团组织及其活动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书法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三为该时期的著名代表书家与地域书风，分区域介绍新、马各时期著名书家及其书作，重点考察他们之间的传承、演变及影响。

目录

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书法的启蒙与孕育时期（1900—1945） 1

第一节 华文教育的萌芽与成形 2

第二节 华文书法教育的启蒙与孕育 6

第三节 书法团体的出现 8

第四节 中国政治人物及书画家南来 11

第五节 第一代先驱书法家与地域书风 17

第二章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书法的低迷与沉寂时期（1946—1956） 43

第一节 华文教育的缓慢发展 43

第二节 书法教育的低迷与沉寂 45

第三节 书法团体日益壮大 46

第四节 著名书家与地域书风 48

第三章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书法的危机与困境时期（1957—1980） 54

第一节 华文教育的危难与困境 54

第二节 书法教育的转机和普及 58

第三节 书法社团稳步发展 62

第四节 书法比赛、书法讲座盛行 63

第五节 过渡时期的著名书家与地域书风 65

第四章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书法的蓬勃与发展时期(1981—2000) 96

第一节 华文教育的契机与发展 96

第二节 书法教育的繁荣发展 101

第三节 书法团体层出,百家争鸣 102

第四节 书法活动的普及与繁荣发展 106

第五节 第三代书家与地域书风 120

附录一 新加坡、马来西亚相关教育史、美术史等研究文献资料 158

附录二 新加坡、马来西亚书画社团特刊资料 161

附录三 新加坡、马来西亚书法比赛作品集资料 163

附录四 新加坡、马来西亚书法展览作品集资料 165

附录五 新加坡、马来西亚书法论文资料 171

附录六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各联委会会务报告、会议记录资料 174

附录七 新加坡、马来西亚报章资料 175

后 记 176

第一章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书法的启蒙与孕育时期 (1900—1945)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文书法发展与该地区华文教育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最初的书法教育也就是识字和习字，可视为华语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华语教育从识字和习字开始，尤其是私塾教育极为重视学生的习字课，这为马来亚一带的学生学习书法奠定了基础。虽然只是每天练习，没有充足的讲授和专门的点拨，更不具备书法的艺术内容，但是对马来亚的华校学生而言，已经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了。华文教育在近一百年来面临无数的危机和困境，但是都在华人社会的同心协力下被一一克服。书法教育作为华文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是随着华文教育的发展而发展的，并未形成自己独立的地位。一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华文教育地位的稳定，书法教育才得到华人社会的普遍关注，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体系。总之，华文教育作为华文书法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汉语是华人的文化根基，语文教育无法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华族就会成为失根的民族，华人特有的传统文化艺术就难以在这里生存和传播。所以唯有华文教育的稳定发展和华文价值的提升，才能带来华文书法的繁荣和发展；否则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更遑论其繁荣和发展了。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第一节 华文教育的萌芽与成形

“海外到处有华人，有华人必有华校。”这是马来西亚华教总副主席陆庭谕先生对海外华侨注重办学、兴教历史的精辟概括。据有关资料显示，华人移居海外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至今约有五千万华侨华人分布在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华侨华人居住的地方，就有不同方式的华文教育活动。早在两三百年前，广大华侨华人在世界各地开始创办华文学校。辛亥革命后，已涌现出一大批华文学校。近几十年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掀起“汉语热”的浪潮，华文学校更是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遍布世界各地。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私塾与华文学校遍布全国。20世纪以前，马来半岛的华文教育以旧式私塾教育为主。1815年，马六甲共有9间华侨创办的私塾，其中8间专供福建籍的学童攻读，另外一间供广东籍学童就学。1828年，新加坡也有3间私塾，供广东籍、福建籍学生求学。此后私塾教育迅速发展，至1884年，在海峡殖民地华侨创办的私塾共有115间。^①其中比较著名且留有碑铭可考的有新加坡的崇文阁和翠英书院。翠英书院前后维持了整整一百年，至1954年才并入福建会馆主持的学校。至19世纪末，马来亚其他各州也陆续出现私塾。这一时期的私塾教育，大抵与中国私塾教育一样，皆以方言传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典籍，同时也教授书法和珠算。学生“自五六岁开蒙以至二十岁左右，读完了四书五经，学作八股”^②。教学设备大都非常简陋，直到20世纪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改善。“学塾设备，因陋就简，既无学科设备，又无课外活动，黑板脱漆，桌椅支离破碎，十分寒伧。课室只有一间，学生不论多少，拥挤一处，光线暗淡，空气污浊。”^③实际上，这时候

① 林水椽、骆静山：《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年版，第283页。

② 陈育崧：《椰阴馆文存》（第二卷），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1983年版，第227页。

③ 许苏吾：《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新加坡：新加坡南洋书局1949年版，第180页。

的私塾教育只求认识一些方块字及懂得一些常识、簿记而已，而其特征是短期性、间歇性和缺乏计划性。^①

虽然如此，这一时期的华侨私塾教育在传播中华文化，提高文化素质，联络和团结华侨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是，到了19世纪末，私塾教育那一套陈旧的制度，已经完全不能适应迅速发展起来的华侨社会的需要。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发动了侵华战争，中国内部军阀混战也愈演愈烈。此时的中国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局面，导致沿海地区一些居民纷纷背井离乡，南下谋生。1871年至1901年的三十年间，马来半岛华侨人口呈剧增之势。1901年，华侨人口已达2 418 615人，占总人口的44%。此时的华文教育以旧式私塾为主，但不成体系。^②直到1900年，华校因中国维新运动及辛亥革命的影响而开始蜕变，纷纷建设新式的华校以取代旧式私塾。

新式学校的创立，是在20世纪初。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后维新变法运动失败，维新人物康有为亡命南洋，所到之处，鼓吹华侨兴学。这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初期起义（如1895年的广州起义，1900年的惠州起义）失败之后，革命志士不少流亡海外。这些人到南洋时，也同样鼓吹兴学办报，宣传爱国主义。维新派和革命派的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教育，他们在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大力提倡并协助兴办新式华侨学校，可以说对于新、马华侨学校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于是，马来半岛上陆续出现了一些新式的学堂，迅速取代了旧式的私塾教育。1904年，槟城中华学校成立。这是马来亚第一所新式学堂。清政府特派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南洋学务大臣、原驻新加坡总领事张弼士管理中华学校事务，光绪帝御赐“声教南暨”匾额及《图书集成》书本。学堂初期开班招生160人^③，所教授的课程包括修身、读经、讲经、国文（华文）、外国语（英语）、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学、体操、图画、理财学等。^④1905年创办的养正学校（原名广肇学堂）和崇正学校

①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1998年版，第16页。

② 莫顺生：《马来亚教育史》，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2000年版，第15页。

③ 陈育崧：《椰阴馆文存》（第二卷），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1983年版，第262~269页。

④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1998年版，第101页。

(原名养正学堂),是新加坡最早创办的新式学校。接着创办的有应新学校、端蒙学校、启发学校、宁阳学校等 36 所。到 1914 年,马来亚的新式华人学校已达 115 间。^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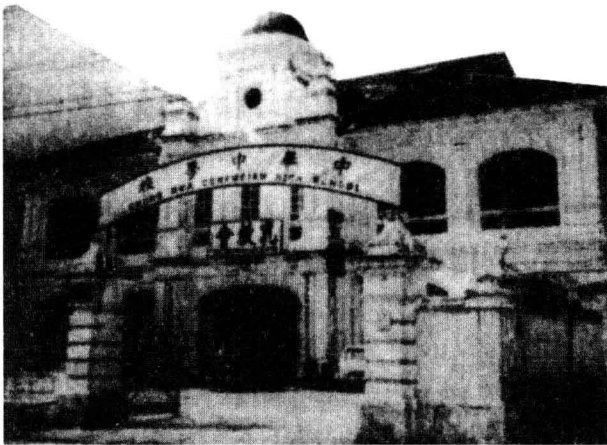


图 1 檳城中华学校是马来亚第一所新式学堂^②

这时期马来亚华文教育主要是中国侨民教育,它的学制、媒介、教学方法与教学目标都是全盘采用中国教育制度。教员有的在当地物色,有的则到中国大陆延聘。在教科书方面,自民国以后,中国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根据民国政府制定的教育纲领,大量地出版了适用于海外中小学的教科书。而马来半岛华校所用的教科书,大部分都是来自这两间书局。另外,上海的一些出版社也出版了有关的教科书,让马来半岛华人选用。这些教科书的内容基本以中国的文化、人物、地理、历史及党国意识为主。^③因此,当时的华校学生在对中国的情感及认识上要比对马来半岛整体水平更深刻和深入。而中国大陆所发生的政治动荡和学潮等时事,都会直接影响到马来亚华校的学生。

^① Lee Ah Chai, *Policies and Politics in Chinese School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786 - 1941*, M. A. Thesis, University Malaya, 1957, p. 1.

^②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1998年版,第96页。

^③ 莫顺生:《马来西亚教育史》,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2000年版,第22页。

图2 商务出版图书中《长江》一节^①

当“五四运动”掀起以后，马来亚华人学府无一不受到影响。英殖民政府向来对华文教育发展采取漠视的态度，但是为了遏制“五四运动”反殖民主义思潮侵入华校，竟然直接干预华文教育的发展。1920年，英殖民政府颁布《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在课程纲要、行政与卫生等方面要求华校必须符合殖民政府的要求。这是英殖民政府第一次干预华文教育的课程设置。随后，在英殖民政府委任的华校督学官金文泰（Cecil Clementi）总督的监督和管制下，“华校教科书被禁用，规定华校教师本土化，关闭三百多间违反学校注册法令的华校，并以经济不景气的借口而取消方言学校的津贴”^②。但是华校依然坚持办学。同时，中华民国政府在这个时期成立一个海外华侨教育机构，宣扬三民主义，也在经济上援助华侨学校。^③民国政府所提供的经费虽然不多，但是在华人自力更生之下，华校不减反增。1921年，海峡殖民地与马来联邦的华校有252间，教员为589人；1929年，华校增至711间，教员为1900人；至1938年，华校间数再增304间，达1015间，教师人数为3985人。^④1934年总督金文泰退休后，英殖民政府

①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1998年版，第357页。

② 莫顺生：《马来西亚教育史》，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2000年版，第58页。

③ 莫顺生：《马来西亚教育史》，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2000年版，第58页。

④ 1219华教盛会工委史料展组编：《华光永耀——1219华教盛会华教史料展汇编》，雪兰莪：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1993年版，第3页。

调整了教育政策，重新给予华校津贴，并承认华语是华侨的教学媒介语。^①

表 1 1921—1938 年海峡殖民地与马来联邦的华校、学生及教员统计表^②

年份	学校	学生	教员
1921	252	—	589
1922	391	—	980
1923	537	—	1 362
1924	564	27 476	1 257
1925	643	33 662	1 390
1926	657	36 380	1 493
1927	665	40 760	1 637
1928	696	43 961	1 806
1929	711	46 911	1 900
1930	716	46 367	1 980
1931	657	39 662	1 867
1932	669	41 858	1 929
1933	731	47 123	2 021
1934	766	54 618	2 371
1935	824	62 014	2 730
1936	860	70 483	3 058
1937	933	79 993	3 415
1938	1 015	91 534	3 985

第二节 华文书法教育的启蒙与孕育

20 世纪初期，中国文人的大量到来，开始为这片土地注入中国文化的气息，也为书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上，华人社会只是将书法列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并不是以艺术的方式来看待，故写字只是

① 莫顺生：《马来西亚教育史》，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2000 年版，第 22 页。

② 1219 华教盛会工委史料展组编：《华光永耀——1219 华教盛会华教史料展汇编》，雪兰莪：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1993 年版，第 3 页。